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 著

第三帝国 军事情报局内幕

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 著

时 波 节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7507



世界知识出版社

1157507

Heinz Höhne

Canaris

Balland, 1979

根据法国巴朗德出版社1979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高曾蓓

封面设计：王麟生

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 著

时 波节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礼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1032毫米32开本 印张：16.75 字数：369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7 5012 0092 0 K·15 定价：3.50元

译者的话

这是一本揭露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的书。作者海因茨·赫内是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兼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纳粹德国军事情报局是盖世奸雄希特勒赖以巩固其法西斯统治和疯狂侵略扩张的支柱之一。海因茨·赫内查阅了大量迄今尚未公布的第三帝国档案资料，特别是查到了军事情报局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的一批鲜为人知的材料。在此基础上，赫内以卡纳里斯为主线，撰写了这本书。

值得指出的是，在纳粹德国覆灭前夕，希特勒下令绞死多年效忠于他的威廉·卡纳里斯。从此，这个谍魁在西方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笔下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纳粹统治的英雄。然而，赫内花了多年时间，深入研究了他占有的丰富史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在本书揭开了卡纳里斯这个纳粹分子的本来面目。同时，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于了解军事情报局内幕和纳粹德国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矛盾，以及二次大战期间两大营垒之间的间谍反间谍斗争内幕，都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本书笔调类似报告文学，读来引人入胜，这也是本书的优点之一。

本书作者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论述和人物的评价，或未尽全面允当，或观点略嫌偏颇，这是西方史学家在所难免的，相信读者阅读时会有所鉴别。此书中所述材料是否全部可靠，

还有待其它材料印证，这是自不待言的。

本书原为德文，译者根据法国巴朗德出版社1979年法文版译出。原法文版书名为《卡纳里斯传》。为了切合并明确本书基本内容，译者将书名作了改动。全书共十二章，原书各章标题为：第一章“在海军”，第二章“为反革命效劳”，第三章“光辉的业绩”，第四章“在情报部迷宫里”，第五章“情报部头目”，第六章“在元首的魅力下”，第七章“转折点”，第八章“走向战争”，第九章“最后机遇”，第十章“为海德里希流泪”，第十一章“崩溃”，第十二章“弗洛森堡大屠杀”。为了便于我国读者阅读，译者另拟了各章标题并附加了少量注释。原书某些章节，主要是前三章，与《第三帝国军事情报局内幕》主题内容无关，译者酌予删节，因此中译本的第一章至第九章为原书的第四章至第十二章。

1986年12月

于北京板井村

目 录

第一章	时来运转	平步青云·····	1
第二章	狼狈为奸	同床异梦·····	33
第三章	紧锣密鼓	鬼蜮伎俩·····	72
第四章	婚事风波	扑朔迷离·····	121
第五章	得寸进尺	欲壑难填·····	192
第六章	最后机会	孤注一掷·····	243
第七章	兔死狐悲	绝望挣扎·····	331
第八章	四面楚歌	大权旁落·····	408
第九章	山穷水尽	魂归苍天·····	490

第一章

时来运转 平步青云

“他快来了！”这个消息象点燃了的导火索一样在北海基地司令部各个办公室传开了。威廉港的军官们无不为之着迷。“他”已经在路上了！

那是1932年5月23日。这一天要来的人非同小可，他是德国各党派领袖中复仇心最强的人，他领导着这个国家空前壮阔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场反对处于四面楚歌的共和国的复仇运动。可是，对数以百万计的公民们来说，共和国乃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一心想在海军当家作主的威廉港确立对元首的迷信。

正如《民族观察员》报用罕见的笔调报道的那样，“在从吕斯特林根去威廉港的路上，每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手持小旗伫立在精心布置过的小屋前等待着元首的到来。”随着他的汽车驶近，道路两旁人行道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汽车停在吕斯特林根的许茨恩霍夫饭馆前。“大厅里只能容纳一部分前来欢迎的人。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外边，聆听着扩音器里传出的元首的演说。”

海军的大批军官换上便服，也都来倾听平日在各自食堂里吃饭时经常议论的这位政治人物的演讲。这个人额头上斜

披着一绺黑色的头发，身穿式样奇特的褐色制服，看上去甚是古怪。从希特勒的外表和行为看不到任何一点蛊惑人心的影子。可是当他登上讲台，用他那特有的方式和断断续续的句子发表演讲时，他简直成了另一个人。他比任何人更善于描绘德意志民族的痛苦和不安。

对于这类人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了。德国正处于似乎已经无可救药的社会政治危机之中，比任何国家都更为痛苦地遭受着世界经济萧条的折磨。失业人数达540万。被通货膨胀拖垮了的中产阶级眼看着自己生存的地盘日益收缩。普遍的贫困大有摧毁共和国勉强保持的全国一致的危险。

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不得人心的。对社会党人中的左派来说，它带有“糟得很的社会化烙印”；在资产阶级看来，这个多党制的国家与其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体制，倒不如说是各种利害关系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之地。1919年在社会民主党、民主党、中央党支持下建立的“魏玛联盟”的成员，去年已大部分退出。从那以后，德国民主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地保存下来，完全是由于“它的最温和的反对派采取了忍让的态度^①”。各政党无可奈何地试图组织一些联盟，但都松松垮垮、稀稀拉拉，连12个月都维持不了。

当大萧条蔓延到德国时，一个联合政府正领导着这个国家。克服危机的重担落在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米勒和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人民党的党员组成的政府肩上。可是，相互拆台的政府阁员们就改革纲领争论不休，于是政府垮了台，国会找不到合适的人组织新政府：社会民主党——

^① 赫尔穆特·海贝尔：《魏玛共和国》，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历史》，第1卷。

当时最主要的政党——内讧愈演愈烈，拒绝参加新的联合政府。老朽的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是个顽固的保皇派，竭力主张采用强硬的措施。他企图依靠几个心腹统治德国，而把一切党派排斥在一边。

可是，兴登堡任命的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也挡不住当时的潮流。民主制度的最后一批堡垒在失业和派系斗争的令人恐怖的狂风暴雨袭击下——崩塌了。当布吕宁最后在1930年9月要求大选的时候，国家社会主义的鼓动者们吹响了进军号。拥有中产阶级全部选票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举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

中产阶级和一部分工人所遭受的捉襟见肘的艰苦生活又使民主党人以为早就埋葬了的恐惧和欲望死灰复燃了。举国上下响彻一片吼声，要求有一个铁腕人物、一个救世主。这个救世主似乎好多年前就已降临。早在1922年，军事史学家库特·黑塞就热情洋溢地描写道：“我们大家期待的人……就是时刻想着德国所遭受的苦难的人，他的形象浮现在千万人的心里，千百万人欢呼他，德意志的国魂需要他。”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把希特勒比作救世主。不到几年工夫，他的党把一向支持右派和中间派的中产阶级的一半选民争取过来了。1930年，在一种思想和一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政权——的鼓舞下，这个党搞垮了一系列地方上的联合政府。

希特勒的听众越来越多。他鼓吹造反，宣扬要对社会政治舞台实行改革。从来没有哪一位平民演说家象他这样出自内心地、胸无城府地体察到民族的希望、担忧和幻想。是虔诚的传道师也罢，是蛊惑人心的鼓动家也罢，希特勒触到了听众的心弦，利用了他们的轻信。

同群众息息相通的希特勒开始演说时，其口吻总是犹豫

的，他通过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来探测听众的脉络和情绪，以便确定自己的调子。他善于洞察听众的好恶爱憎，迅速迎合对方，然后侃侃而谈，越说越快，句子之间的停顿也越来越多，最后他的嗓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有一天，他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奇迹就是你们在千百万群众之中找到了我，而我也找到了你们。这是德意志的希望之所在！”

1932年5月23日夜晩，就在充满德国北方庄严朴素气氛的许茨恩霍夫饭馆里，希特勒使听众们倾倒了，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和狂热的欢呼。在场的海军军官们也沉浸在对他的迷恋之中，特别是“科隆”号巡洋舰司令、海军上校冯·施罗德。此人邀请希特勒到停泊在威廉港的“科隆”号视察。

5月26日，希特勒在“科隆”号上受到了最隆重的礼遇。尽管他讨厌大海，但他对海军装备的深刻了解不禁使军官们十分惊讶。可以看出，他熟悉造船业的各种技术，当然一些战略方面的细节问题除外。许多军官都被他吸引住了，其中一位记下了希特勒的谈话要点：“一、我将镇压任何变节行为。二、我要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范围内发展海军。三、如果说某艘船是一万吨级的，那它就是一万吨级的，它的真实大小我可管不着^①。”

在离开“科隆”号前，希特勒在留言簿上写道：“愿为建立一支与德国相称的海军而努力。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登上一艘悬挂共和国国旗的军舰的消息不胫而走，施罗德的行为引起了许多高级军官的不满，但得到他的大部分下属的赞赏。这些人支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张，有的甚至出于对强硬措施和对海军传统的依恋，干脆加入了这

① 约斯特·迪尔费尔：《魏玛、希特勒和海军》。

个党。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共和国的左派政党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在1932年7月大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赢得了海军军官们的坚决支持。该年秋天，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参谋长通知海军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他手下的大部分舰长认为，一旦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动政变，当局就不能指望他们的部队。雷德尔自己虽然鼓吹无限忠于共和国，但也已开始为希特勒方面摸底，企图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要参加的内阁中挤到国防部长的宝座。

如果威廉·卡纳里斯看见冉冉升起的国家社会主义这颗新星而迟迟不投靠过去的话，那才怪呢。他同共和国的关系已是江河日下，大势已去。他对魏玛民主政体的一片忠心从一开始就不甚坚贞。在调离柏林后遭到的一场又一场左派报刊的攻击后，仅有的忠诚所存无几了。虽然他对基尔革命后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群众集会和大规模的公开运动心有余悸，但他明白这场运动蕴藏着一种力量，能使海军摆脱枷锁而免于瘫痪，也能把他从1918年以来禁锢着他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

卡纳里斯一直是个君主专制主义者，他幻想“一个永存的德国”能保持其“高尚和伟大”。他始终顺应不了平庸和狭隘的日常生活。他从未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假如有一支超级海军的话，德国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国。国家社会主义为此提供了可能性，它的纲领的其他内容也博得了他的好感。

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猛烈抨击共产主义的口号必然吸引这个老突击队员。早在1931年，他就这样提醒过：“暴徒们（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公开声明，对一切反对者实行

无情的报复^①。”中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普遍怀有奇特的恐惧症，卡纳里斯也有这种病，实在有点大惊小怪了。如同海军中大部分军官那样，他担心德国军事当局同红军勾勾搭搭，因此谴责与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卡纳里斯在柏林供职期间，海军领导执行了一条反共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苏联军舰访问德国军港，只有1929年那一次例外，而且还得到保证，苏联船员不跟德国共产党人接触。海军领导不准放映苏联海军影片。1927年，听说柏林一家大电影院要放映《“波将金”号装甲舰》这部苏联影片，海军领导曾向主要的影片发行人和一系列影院施加压力，直至电影院答应只在一个小礼堂放映为止。

卡纳里斯和当时的上司勒文费尔特曾不遗余力地阻止海军同东方国家建立联系。1926年7月，勒文费尔特邀请海军高级军官们出席一个名为“德国海军的指导原则及其政治宗旨”的讲演会，其中心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大敌人”，德国的天然盟友乃是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法国。勒文费尔特甚至认为，“出于某些经济原因”，波兰会把1918年割去的领土归还给德国，而“从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得到补偿”。然而，德国应当“坚定不移地、秘密地”同英国建立“联系”，因为“如果英国一旦落入共产主义手里，或者……它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那么，出现一个布尔什维克欧洲的危险就迫在眉睫^②”。

众所周知，卡纳里斯的上司提出的建议已被希特勒写进了《我的奋斗》一书。提出这些建议的人不久也就投靠了国

① 卡纳里斯个人档案，德国联邦档案局，二处，M65/2号卷宗。

② 迪尔费尔著上引书。

家社会主义。卡纳里斯的大批同志和朋友实际上早已加入了褐衫队的行列，其中有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哈特穆特·普拉斯和曼弗雷德·冯·基林格尔。就连长期贬低希特勒的埃尔哈特也在盘算着如何弄一套党卫队准将的将军服穿呢。

据卡纳里斯的战友康拉德·帕齐希说，卡纳里斯“很快就成为一名热情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①”。他的生涯的下一阶段使他进一步理解海军内部以及全国的思想状态。1932年9月29日，卡纳里斯升为“西里西亚”号的舰长，该舰大部分水兵早就不把共和国放在眼里了。该舰对北海和波罗的海各港的频繁访问使他们对德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有了一定的认识。就连普通人也明白，民主制度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卡纳里斯在同国社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私下接触中深深感到，即将发生的“制度的更迭”——敌友双方都认为这是一场致命的灾难——不会导致天下大乱或极端主义。在访问汉堡期间，他会见了纳粹党区长卡尔·考夫曼，此人是纳粹党的创始人之一，大家认为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纳粹分子，但对元首绝非无条件地恭顺。考夫曼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的解释之所以使卡纳里斯佩服得五体投地，是因为考夫曼原先也是突击队队员和埃尔哈特旅的一名战士^②。

当“上台执政的日子”终于在1933年1月30日在德国拉开序幕的时候，卡纳里斯早已习惯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主张了。尽管他身处大海，整天忙于日常事务（“西里西亚”号和另一艘军舰“黑森”号当时正忙于在基尔湾进行放

① 1966年1月18日至19日帕齐希海军上将的回忆录音，德国联邦档案局/德国军事档案局。

② 卡尔·海因茨·阿布斯哈根：《卡纳里斯的一生》。

射鱼雷和大炮的训练)，但他照样能沐浴在席卷全国的激情浪潮之中。2月13日，他把“西里西亚”号开入基尔船厂进行检修时，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另一个德国。象帝国时期一样，军人走上了大街；民族主义的口号召唤人们去拯救祖国；举国上下仿佛都在用同一个声音讲话。卡纳里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大批——无数——德国人同他一样激动。

当时已出现了一些恐怖政体的迹象，但卡纳里斯仍然热情地迎接新秩序的到来。他对外边流传有关纳粹党头子们及其同路人国家保守党人的过火行为的流言蜚语耸耸肩膀，嗤之以鼻。象千百万同胞一样，卡纳里斯认为这个新运动虽然显得如此放纵狂暴，但能够将德国从一个枯燥乏味的、令人失望的民主制度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有权威有纪律的更完美的政府。眼前的暴行和恫吓只不过是清除破烂的净化剂。

美化卡纳里斯的传记作家们，试图用晦涩难懂的文字来掩盖他从那时起就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这个事实。阿布斯哈根断言，暴力和野蛮行为在卡纳里斯眼里是“令人十分厌恶的”。“当然，卡纳里斯不难懂得国会纵火案的真实性质。随着事态的发展，又由于没有人出来反对（总之，不存在真正的反抗），卡纳里斯越来越怀疑了，并开始产生了严重的不安^①。”克劳斯·本青也以同样的语言写道：卡纳里斯“很快就对纳粹恐怖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1934年6月发生勒姆事件时，他“最终成了希特勒及其政体的反对者^②”。

在那个时期，卡纳里斯非但没有看清纳粹党的阴谋诡计，反而认为跟新政体合作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他的朋友奥托·瓦格纳回忆说：“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家者，他一开始象

① 阿布斯哈根著上引书。

② 克劳斯·本青：《海军上将》。

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对党灌输给整个国民的活力和朝气很感激，只有这些活力和朝气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难以摆脱的问题。我们在开始阶段几乎都是这样想的^①。”党卫队将军维尔纳·贝斯特是另一位证明人，他说：“（卡纳里斯）是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新的政体比原先的不知要优越多少倍，再说，当时也没有别的抉择^②。”在情报局领导一个处的前中校埃里希·普鲁克也曾指出：“他从一个顺从的信徒变成反对派的一员，其中是有一个渐变过程的^③。”

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卡纳里斯毕竟把批判精神抛到了九霄云外，不允许对政府和纳粹党有任何不恭。就是在勒姆政变中发生的圣巴泰勒米惨案——第三帝国组织的第一次凶杀尝试——后，卡纳里斯仍在鼓吹同新政权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他的私人档案里，我们发现了他的上司、海军少将巴斯蒂安1934年11月1日亲手写的一段话：“我要强调一个事实：两年来，海军上校卡纳里斯不遗余力地使他的水兵们掌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指导新帝国发展的原则。他亲自出马给他们作报告。他在这方面堪称楷模。”

即使没有上述材料，我们也可以从卡纳里斯后来阐述的理论中看出他的立场。他说：“在世界大战前，每一位军官自然都是君主专制主义者。后来，他们自然又都努力维护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同样在今天，每一位军官自然都会投身到需要这种经验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去。我们这些战士为有机会

① 奥托·瓦格纳：《威廉·卡纳里斯》。

② 贝斯特博士的信，1949年12月17日。

③ 埃里希·普鲁克：《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

捍卫极端军国主义的思想意识而感到光荣^①。”

然而他问，国家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恰恰就是战士在战争中认识的和经受的一切，即义务、顺从、情谊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在宣布并解释上述思想的阿道夫·希特勒身旁，军官和普通士兵为新的德国铺下了奠基石……因此，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是第一批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卡纳里斯还认为，“尤其是军官们永远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元首，如果没有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永远不可能恢复德国的伟大的军事实力。国防军永远不可能自发地变成一支国家军队。”每一个军官必然会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说不问政治在帝国时期或战争初期是一种不健康的或危险的态度，而在魏玛国家的军队里却是一种有益的态度，那么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国家里，它就成了—种罪行，一个破坏行为……军官的责任在于做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活样板，在于使武装部队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体现者。这就是我们的伟大抱负。”

任何一个持如此完整的纳粹观点的军官迟早会引起德国新掌权者的注意。但是，卡纳里斯同新政体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起初颇有周折。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5月23日。那天，希特勒、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隆贝格和普鲁士政府总理赫尔曼·戈林到基尔港观看整个舰队的战术演习。戈林在1月间被命名为前线战舰总司令部的将军舰（这是训练时用的战舰称号，现已不用）的“西里西亚”号上过夜。

戈林的视察是在令人扫兴的气氛中结束的。那天演习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下，希特勒的这位狂妄自大、野心勃

^① 卡纳里斯的个人档案。

勃的追随者突然发病。这可吓坏了那些本来兴致勃勃的尉官们。当脸色苍白、一心想吐的戈林进入军官休息室时，一位尉官神色慌张地走上前来说：“总理先生，请原谅，不过，我刚接到一份电报，内称：‘海神致赫尔曼·戈林总理。从今天起，您被任命为德国喂鱼司令，并授权你到渔网中去量体裁衣^①。’”

戈林暴跳如雷，悻悻离开休息室。这时，卡纳里斯走上前来劝慰不快的戈林，不料戈林不甘罢休，命令柏林海军总司令部惩办刚才失礼的那位尉官。卡纳里斯当场拒绝，认为他已经处理了失礼者，戈林仍然坚持，这分明是侵犯他的权力。

尽管这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但妨碍了卡纳里斯如愿以偿地同当权者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国社党的党员们开进柏林，并没有使他立即摆脱自洛曼事件以来所处的倒霉境遇。他又恼又怒，竟同巴斯蒂安闹翻了脸。在性情粗暴、墨守成规的将军同他这个敏感的下级之间，关系已糟到了双方尽可能不说话的地步。巴斯蒂安最后得出结论，卡纳里斯的脾性如此好怒，他不配做一个理想的指挥官。

1933年9月19日，巴斯蒂安写道：“最好还是将他派到他能发挥其观察家和外交家的才能以及他的聪明才智的岗位上去。这样，他就没有机会在日常工作中疑神疑鬼，以致贻害越来越多的人了^②。”

舰队司令弗尔斯特海军少将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从个人的爱好和天赋来看，卡纳里斯不宜负责纯军事方面的工作”。

① 卡纳里斯的个人档案。

② 《秘密报告》，见于卡纳里斯的个人档案。